

華郵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周刊

重慶版

第三卷 第九期

女子教育與學校黨務……………朱家驊

自治——分治——均權……………樓桐孫

物價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方案……………王化成

三聯制度的具體化……………伍士焜

中國民族文化的偉大性……………高慶豐

同盟會時代革命志士提名錄……………江天蔚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女子教育與學校黨務

朱家驊

我國自從提倡女子教育到現在，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可是實際上還不會有多大的成就，推究原因，不外兩種，第一是我們整個教育，沒有中心思想，第二是女子教育本身的缺陷。

就整個教育論，我們過去的教育，自始不曾把握任何一個民族有的中心思想，以為一切設施的最高原則，我們要知道任何一個民族，各有其歷史文化風俗習尚道德性格等所積累而成的中心思想，以為發展教育的根本，如果失去了這個中心思想，決無教育可言。所以英美是民主主義教育，蘇俄是共產主義教育，德意志是納粹主義教育，義大利是法西斯主義教育。至於我國的新教育，却從來不曾自己有個中心思想，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支離破碎毫無計劃，便是模仿歐美取其糟粕棄其精華。同治初年所提倡的新教育，只可說是受外界刺激的反應。當時因為只看到外國的聖甲利兵，鎗砲軍艦，受了幾次挫敗，於是提倡所謂洋務，以為只要學得外國製造鎗砲軍艦的本領，便可抵抗侵略，挽回國運。光緒末年教育宗旨注重尚武，尚武，崇實，尊孔；民國初年又改為注重道德教育而輔以實利主義和軍國民主主義，這些多是支離破碎，沒一個中心思想。到了五四以後，愈加凌亂，歐美各種學說各種主義，風起雲湧，凡是新異的，都要嘗試一下，結果思想不統一，更談不到中心，教育上既凌亂無序，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自更發生不安的現象，直至本黨北伐，國基大定以來，於是全國的思想信仰，漸漸集中於三民主義，教育上才有了一個中心思想，以為作育人才的最高準繩，可是三民主義教育的確立與推行，為時未久，過去的積重，一時不易猝改。

因此抗戰一發生。我們全部教育的缺點，百孔千瘡都暴露了出來，女子教育自亦不能例外。所以要求女子教育的改進，必須首先以三民主義這個中國民族固有的中心思想，灌輸到全部教育裏去，換句話說，要首先厲行三民主義教育。

其次才是女子教育本身的問題。中國的女子教育應該從兩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女子的解放，一方面是女子的服務，這兩方面原來是一貫的。過去只努力於女子解放運動，而忽略了女子服務運動，因此纔發生了許多的流弊。女子已經從家庭裏解放了出來，但逃不到社會裏去。并且連家庭裏也回不轉去。本來本黨提倡女權的目的，是要女子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與男子共享平等的權利，同時要女子擔當起服務的天職，因為要女子服務，才有提倡女權的解放運動。總理首先就主張男女平權，後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本黨張溥泉先生等向參議院提出，要求在約法上規定男女平權的條文；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婦女運動的決議，督促國民政府依據黨綱對內政策第十二條的規定，實施女子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的平等。以助女權的發展；後來更在新頒民法上規定女子的繼承權和財產的獨立。這許多提倡女權的運動和設施，其最終的目的，便是要女子擔當起服務的責任，以謀社會和國家整個福利。

因為女子無論在服務的能力上或者在服務的成績上統不亞於男子，據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的研究，女子的智慧常有超過男子的地方。人類初期的發明，出於女子之手的很多，最初教人取火，教人播

種，教人紡織，建築以及陶冶等事，都是女子發跡的。我國古史所記女媧燧祖的事跡，現雖無確信，然長壽之時，致有有娥，閼宮之什，頌及姜嫄，是商周皆尊女性為生民之始，這可以看出「敬數五教」和「俾民稼穡」的來源了。我們如果再研究希臘宗教史，有許多地方，更可以參證；希臘人所崇拜的火神，收種神等等都是女子。女子能力的減低，是以後社會制度束縛女子的結果。但是在以後的歷史上，我們仍舊能夠尋到女子發揮天才的痕跡。至於近代世界各國革命事業中，女子的能力和成績，尤其斐然可觀，在法國革命中，羅蘭夫人，羅善爾，考拉利奧，羅沙，拉康普都是當時主要的人物，在美國革命中，女子參加革命的，有梅爾西，烏奧林等。至於我國，每次的革命，也多有女子參加，庚子拳變時，唐才常起義於漢口，未成，女士周福貞，毛芷香，劉蕙芳三人殉難。這是為革命犧牲最早的女子。光緒末年秋瑾同志的從容就義，黃花園之役，女學生作秘密運籌軍火的工作；辛亥革命時，有女子組織的軍隊很多，如吳淑卿的女軍，尹銳志的浙江女子軍，沈警香的女子軍團，辛素貞的女國民軍，以及女子決死隊，暗殺隊，北伐隊，軍事團，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等等；及至北伐時期，女同志更踴躍的參加了，這都是最顯著的例子。以上多足以證明女子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成績，本來很有可觀的。如果能夠教育得當，使所有全國女子，統能擔負起為國家民族服務的責任，那末所得的成績，便非常的偉大。尤其是目前抗戰建國時期，前方後方，有許多工作要用人力去發展，如果全國的女子統能各盡其責，積極參加，那無異把我們的國力，增加一倍。

不過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國力組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女子服務的方向，應該配合我們國力組織的需要，我們並不主張像德國那樣提倡所謂三區運動，僅僅要女子管理廚房，養育兒女和進教堂作禮拜。就只希望女子向家庭，教育，和宗教三方面去為人類服務，不過我們覺得女子的服務，應該以家庭的服務為起點，這不是說，

除了家庭服務以外，便不應擔任家庭以外的事情。現在的抗戰和將來的建國正需要女子在家庭工作以外，擔任其他社會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種種工作，以充實和增加我們的國力，我們很願意提倡女子去參加政治，去服務社會，去救治傷兵，去教育難童，去幫助農事，去到工廠做工。但我們同時更不能忽略了家庭是我們國力的基本組織，家庭的改革，最需要女子努力的。我們現在的家庭制度，浪費，自私，生活不能合理化，一切缺乏社會性，太和我們國家的需要相背了，在我們抗戰建國的時期，家庭制度之需要從新建設，是一件急不容緩的大事，其重要性實不亞於前方的作戰和後方的生產，我們可以法國的女子，來作鑒戒，法國的女子，近年貪圖享樂，不顧家庭，相習成風，以致人口減少，國力削弱，這次戰敗，未始不是一種重要原因。再反過來看看我們的先哲忠義，如孟子，王陵，范滂，陶侃，歐陽修，岳飛，顧炎武等，那一個不是出於賢良的母教呢？所以我們對於女子教育治本追源，應該特別注意於健全母性的培養，發揮女子仁慈博愛的特性，使我們將來的家庭組織，切合國家民族的需要，家庭能夠健全，國家就會強盛，因為家庭和國家是同一的混合體，不是兩種對立的個體。所以培養女子治家的能力，同時也就是培養女子社會服務的能力。一個平時善於治家的女子，到社會上去服務，必定會有很好的成績。古人云：「一室不治，何以治天下？」大學謂「家齊而後國治」這些話，在女子教育上，頗有深長的意義。

總之本黨在女子教育方面所抱的政策，不僅是解放女子，使其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以助進女權之發展，尤其要培養女子的特性，使其改革家庭，以適合國家民族的需要，由家庭的健全，進入國家的強盛。我們現在舉辦學校黨務，關於女子教育部分，即擬定此政策，與學校當局協力推進，深信今後的女子教育當能符合本黨的政策，有所成就，以利國家。

x x x x x

自治——分治——均權（又名「集權分治」）

樓桐孫

——從理論上說明憲法草案自治制度的確當——

一 先說自治和幾個相關的名詞

「治就是管理」。某一特定地區的公民，自行管理該地區「衆人的事」，就叫「自治」。「衆人」的範圍，有大有小，大之如全國公民，管理全國「衆人的事」，叫做「政治」。這應該就是「自治」與「政治」的區別：「政治」包括「自治」；但「自治」却不是「政治」。

同樣，「衆人的事」，有全國公共一致之性質的，亦有各地因地制宜之性質的；前者為「政治」的對象，應該劃歸中央；後者為「自治」的對象，應該劃歸地方——叫做「地方自治事項」。因此，「地方自治」的「地方」，決不是聯邦國或所謂「聯省自治」那與中央「分庭抗禮」而儼然對立的「地方」，乃是國家整體中的「自治團體」和立國礎石。國父中山先生在「自治制度為建設之礎石」文中曾說：「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今假定民權以縣為單位，我國今不止二千縣，如蒙藏亦能漸進，則至少可為三千縣。三千縣之民權，猶三千塊之礎石」。可見建國大綱所載以「縣為自治之單位」和上述「民權以縣為單位」，都祇利用現成的國家政治基層——縣，以實現直接的民權——自治。這只是直接行使民權的一種平面的區分——立體的間接行使民權，就是在中央的國民大會——而沒有任何地方的屬性的。所以「地方自治」，只須着重於「事項的如何推行，而不可誤解「地方」二字為一種政治的單位」。

「政治」重在「獨立」(L'indépendance)；「自治」至多只能講「自立」(L'autonomie)。前者是絕對性的，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限制，那種權叫做「主權」(La souveraineté)；後者是必須在國家法律所定範圍之內而應隨時受國家機關的監督指揮，那種權叫做「自治權」(Le droit d'autonomie)。國父雖然亦有時把人民在縣所行使的直接民權，稱為「人民之實行其主權」，但那「主權」二字，不過是偶然借用的而決不可把「自治權」與「國家主權」混為一談。

「權在於官，不在於民，則為官治」。「官治」云者，政治之權付之官僚，於人民無與。……民治則不然，政治主權在於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間接以行使之（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可見「自治」是對「官治」而言。依政治史看來，「官治」的形態，大致有二：一是君主的官治，一是民主的官治。前者如歷代的君主專制，自無地方自治之可言；後者如歐洲中古時代的自由市和法蘭西共和國，名義上雖有自治的建制，但實際上各地人民對於各該地公共的事務，亦並不享有多大的自治權。不過大體而論，官治必與君主相表裏，民主多與自治相關聯。君主而許自治的，如果「絕無」（清光緒末年所頒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從沒有真正實行過）；民主而不自治的，則屬「僅有」（上舉法國，是一種例外的現象）。這是「自治」與「官治」的區別和二者間相互的關係。

單說自治，亦可分兩種意義。廣義的自治，略同於政治上的自由。由人民自己主持政治，政府一切設施，都須以民意和輿論為唯一的準則，英美學者稱這種政府為「自由政府」，這種國家為「自

由國家」，這種國家的「自由人民」(un peuple libre)。

在這裏，「自治」與「民治」，可說是毫無分別的同義詞。狹義的自治，是僅指人民參加管理本地地方公共事務而言，與國家政治截然兩事。我國憲法草案第五卷第二節所定關於縣自治的制度，顯然是狹義的自治。

可是就每一個單位而言，「自治」就是「具體而微」的「民治」，而「民治」不過是「自治」的擴大和總和。「自治」的重要在此；「自治」之所以為現代民治的基礎亦在此。

二「自治」與「分治」

們這裏所說「分治」，不是民國十年前後曾經有些人士所提倡過的那所謂「分治合作」的「分治」。「聯省自治」等於是「分省割據」的別名，固為本黨所根本排斥。即「分治合作」，如果當時照着實行，亦未始不會造成「分區割據」的局面，決非所以完成真正統一的辦法。這在民國政治史上，亦即是在中國革命史上，都是很關重要而微妙的問題。我們在這裏附帶提及，為的只是要說明作者二十多年來所主張的「集權分治」，從理論上簡單證明憲法案所定自治制度的正確。

作者當民國十二三年在法京遊學時，對於中國政制即有「集權分治」的擬議。嗣見此種理想雖與國父的民權主義的精神完全符合，但以國內政治環境和時機都還絲毫不會成熟，所以除在歷來若干論文和演講裏附帶提到以外，終於未敢妄作主張以免在當時極為混淆的國論中平添一些無謂的爭辯。其實此次憲法草案所定自治制度，就是這種「集權分治」的實施綱領。這在作者私衷，是很引為快慰與榮幸的！現在想把「分治」的主要論點，略述於後，以供國人的參考：

原來政治形態，無論古今中外，歸納而言，不外左列四種：

(一) 集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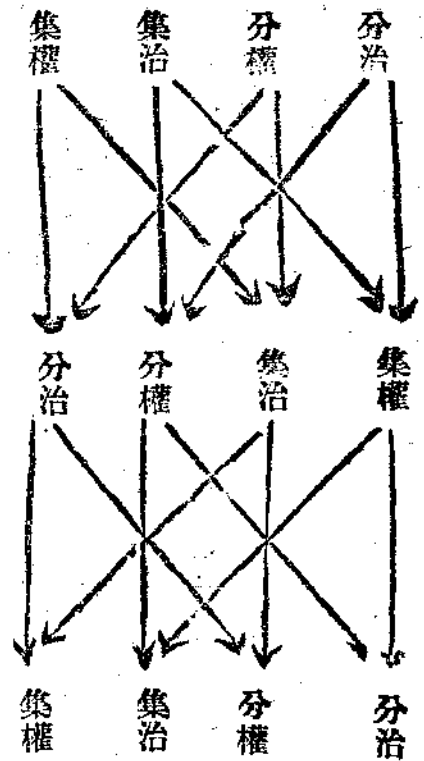
(二) 集治；

(三) 分權；

(四) 分治。

凡國家大權，(在國父未發明「政權」與「治權」的區分以前，世界各國，無論名稱為何，其實都祇有一種權，)集中於一人——君主，一政府或少數人——貴族，僧侶等之手去加以行使的，叫做「集權」。凡「衆人之事」，不論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總之，凡是公共的事務乃至有時非公共的事務，統統集中於一人(至少名義上)——君主之手去加以治理的，叫做「集治」。反之，由有權的人，自願把一部份或大或小的權，分給他人去行使，但又隨時可以把那種權收回的，叫做「分權」。由國家法律，(包括根本法和普通法律)，把「衆人之事」，依照事務的性質，定明某些事歸中央，某些事歸地方，去分別加以治理的，叫做「分治」。同一「集治」，固然可以「集權」，亦可以「分權」。同一「分治」，固然可以「分權」，亦可以「集權」。反過來說：「分權」有的是在「集治」之下分的，有的是在「分治」之下分的。「集權」有的是在「集治」之下集的，有的是在「分治」之下集的。「治」的對象是「事」：什麼事都是我的，就叫「集治」；有些事歸我來治，另有些事則應歸他人去治，這叫「分治」。「分治」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不能由政府以意出入，美國等聯邦國家，是舊式「分治」的代表例證。再如我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亦可說是近於此種形態的體制。「治事」必有「權」。一切事都由我「大權獨攬」，就叫「集權」。「集治」而又「集權」，秦始皇和袁世凱之流，就是這樣做法。但若把我的一部份或大或小的權力，分給我所信任的人去代為行使，那就叫做「分權」。「分權」是出於有權者的自願而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所以要分就分，要不分便又可以收集回來。清朝自洪楊以後，各省督撫的權力非常龐大，就是這種「集治分權」的顯例。為要易於顯示這種理論上的分析，可以把「分治」，「分權

「集治」，「集權」四種形態相互的關係配合如左表：



近代「民治」的制度，必然不是「集治」。「集治」的體制，君主專制——無論「分權」也好，「集權」也好，都不合於現代的潮流。（目前有少數所謂「極權國家」Etats totalitaires，在理論上，屬於「集權集治」的一類，決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

國父提倡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革命之主義）。「民主專制」——如果可以比為「集權（民主）集治（專制）」，則「民主立憲」，便可以比為「集權分治」。所以國父很強調的斷定：「非行以縣為自治單位之策，不能奠民國於苞桑」（見同上）。我們知道這以縣為自治單位的政策，亦叫「分縣自治」（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把全國各地事務「有因地制宜之性質的」，用法律規定分由各縣人民自行治理，直接行使四權以實行「全民政治」，「以行主權在民之實」（見同上），實為三民主義最崇高而又極切實的政理想。這理想的中心關鍵，就在「分治」。再重複一句：「分治」就是用憲法或法律來把「衆人之事」別明「空間性」，分由中央和各縣同時並治。所以在每一縣人民的立場而言，該縣事務，由該縣人民自行治理，亦就叫做「自治」。「分治」與「自治」，實質上是完全二而一，不過一是站在國家法律的立場，一是站在地方

，人民的立場，所以名詞因而不同罷了。

其餘——那是很多很重要的，——「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固然應該分由中央治理，而且治理這類事務的權力，依近來世界的趨勢，宜「集一而不宜「分」。這是依法「分治」以後的「集權」。這種「中央集權」，亦就叫做「民主集權」，是決不致流於專制的。國父曾說：「夫專制云者，與立憲為對待之名詞。苟其立憲，雖中央集權何害？」為什麼呢？因為這祇是「權力之分配，不啻挾一中央或地方之成見」（見同上）。這是「集權分治」，亦即是憲法草案所定自治制度的簡單說明。「集權分治」四字，並不是作者標奇立異，實際上，「此乃近世政治學者所已知已行」不過大都國圖吞棗，未肯從理論方面做一番「循名覈實」的分析而已。（作者於民國二十二年於時代公論發表過一篇「均權的理論與實際」，由該社印有單本，對此問題，討論頗詳。惜此書現在無從尋覓。）

三 均權？

什麼叫做「均權」？年來論者，發揮甚多，未可縷述。

但依個人愚見，差不多都被這個「權」字外表所困，而往往以「中央」與「地方」，甚至以「單一」與「聯邦」作為所謂劃分權力的對象和主體，而務求使之均衡。

殊不知「自治」固為「分治」的複相，而「分治」亦即為「均權」的別稱。上文說過，「治」是「治事」。政治事務，萬緒千頭，非但可分，而且為要治理得宜，增強效率，非分不可。至於權，完全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是人類用來奮鬥」以求生存的（總裁言論卷一第五十七頁）。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裏說：「第二之主義（民權主義），為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說到國家成立的要素又云：「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

物價問題癥的結及其解決方案

王化成

一、引言

現在抗戰將到最後勝利階段，同時也是最艱苦的階段。一切戰時問題，都快到總解決的時候，同時也是最紛歧複雜的時候。這些問題裏面，影響國計民生，關係抗戰建國，最嚴重的要算物價問題。

戰時物價的高漲，本為必然的現象。但上漲有它一定的原因，也有它一定的限度。否則突飛猛晉，漫無止境，不特可以影響人民生活，破壞經濟基礎，而且可以危害大局，動搖國本。故平抑物價，已成爲舉國一致的呼聲。

因此，國防最高委員會特成立物價審查委員會，以謀後方物價的安定；全國學者亦多發表專文，以研求解決的辦法。這些都可以說明：我們爲求抗戰勝利，爲求建國成功，爲求民生安定，都應該對物價問題迅速的得到合理而圓滿的解決。

實際方案，要待多數專家去慎重決定。本文研討的目的，只在說明問題的真相，并略提供解決的辦法，以供關心物價問題者的參考而已。

二、戰時物價上漲的原因

戰時因爲生產減少，資源缺乏，運輸困難，供需失調，物價上漲，本爲當然的現象。

現在試說明其一般上漲的原因：

第一、是由於生產力的轉移，而形成日用品生產的減少。戰爭

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統治權力屬於國民全體，叫做「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以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又說：「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可見即依「國父遺教，政治權力還諸東西，原則上，本來是不可分的。「權」而曰「均」，則必先可「分」而後能「均」。然而「國父在對內政策第一條裏，明明說「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者，揆其原因，不過是沿用當時一般人籠統的用語，以便使國人易於了解而已，決不是說與「集權」對待的「分權」的意思。這是作者敢斷言的。因爲我們通觀「遺教，凡有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國父都很堅決的排斥「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的謬說。「分」既不可，「均」從何來？「均權」二字，不能作爲「把政治權力分得平均」講，而應該作爲「分配事務，由中央與縣同時並治」講，無論在理論上或在事實上，都屬毫無疑義。這種事務的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爲對象，而當以他的性質爲對象。性質宜屬於中央的，如軍事外交等，自當屬之中央，統一行使而不可紛歧。反之，如各縣警衛，山林水產等事，「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的。所以「國父不是明明說嗎？「要之，研究權力之分配，（讀者宜注意「研」二字，）不當換一中央或地方之成見，而以其本身（「按按「本身」就是指權力所被的事務，觀下句緊接「事」字自明）之性質爲依歸。事之舉國一致不可者，以其權屬於中央，事之應因地制宜者，以其權屬於地方。易地域的分類，而爲科學的分類，斯爲得之」（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這所說「地域的分類」，明明是指一般人所誤解的「地方分權」而言；所說「科學的分類」，當然就是說依照事務的性質而爲應歸中央，或應歸地方治理之分配的意思。這是我們對於「遺教很客觀，很忠實，而又完全合於理論，切於實際的解釋，凡誠心信服三民主義的人所應細心體悟的。

依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下面這個簡明的結論：

在憲法上把「衆人之事」，依其性質，分由中央或各縣治理，叫做「分治」；應歸中央所治理的事務，必須「集權」而不可「分權」；應歸各縣所治理的事務，必須「自治」而不可「官治」。「自治」是「分治」的實行；「均權」是「分治」的原理。換句話說：「分治」是「體」，「自治」是「用」，而「均權」乃是「體用兼賅」的原理。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六日於獨石橋

需要多量的物資，國民平日消費的物資，自然相對減少。戰爭需要多量的人力，國民消費品的生產力，自然比例衰退。平時國家大部份的生產，最後目的在於增加國民消費的總量；祇有一小部份用於國防的設備，反過來，戰爭開始以後，國家傾全力以求戰爭的勝利，因戰爭而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自具有從消費品的生產力方面轉移。故在戰爭期中，因全國國民的奮發，國家生產力的總和雖絕對增加；而國民生活日用品的生產力，却相對減少。因生產力的移轉，而供給減少。供給減少，物價自然上漲。

第二、是由於戰區擴大而致資源的缺乏。資源因受天時地理的限制，生產習慣與技術的束縛，甲地的產物每不易滋生於乙地。礦產固然是固定不移，而農產也往往因氣候土壤關係，不易移植。生活日用品某種資源的生產地一旦成為戰區，以致不能生產或開採的時候，此種物資自然驟然缺乏，價格便隨着缺乏與需要的程度而上漲。譬如江西瓷器的白釉碗，一角錢便可買到，而重慶却要賣價三元；就因為江西成了戰區而四川不產瓷器的緣故。

第三、是由於軍運頻繁，運輸困難。平時運輸，水路有海運，江運；陸路有火車，汽車，飛機的聯運；各地物資調劑，互通有無，價格常穩定於一定的平衡線上。抗戰以後，九千五百公里的鐵道，僅剩下二千一百公里了；十萬公里的公路，也只剩下七萬六千公里了；雖然有五百八十里鐵道與若干新公路的建築，畢竟是得不償失，便利的交通工具，已大部不復存在了。即以僅存的交通設備，也多用於國防運輸，商品運輸自然大感困難。因而甲地產物不能輸至乙地銷售，結果是：此項產物，在甲地因供給過剩而滯銷；在乙地轉因供給減少而漲價。有些貨物即使輸出，也因運費增加，自然漲價。這也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譬如進口鋼材，戰前不過一百五十元一噸；戰後因匯價關係，也不過三百元一噸；但從昆明運至重慶，每噸需運費一千二百元，加上保險，關稅等費，於是在重慶市價，鋼材每噸就要二千元以上了。

此外，輸入物品，因外匯上漲而上漲，也是影響一般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譬如戰前法幣一元，等於港幣一元；戰後則需法幣四元才能購得港幣一元。如向香港採辦貨物，戰前一元可購的物品，現在假定香港價格不變，也就需法幣四元才能買到了。故因外匯的高漲，使國幣的對外比率，相對減低，而由外匯購進物品，自然漲價。不過，這只是極少數的物品而已，並不足以影響一般國民的生活。

這些物價上漲的原因，或由於生產力的移轉，或由於物資的缺乏，或由於運輸的困難，或由於外匯率的降低，都是對外作戰期中無法避免的現象。除了政府運用統制與管理的權力，使那些困難減至最小限度以外，別無善法。所以人民對戰時因必然原因的物價上漲而感受一些痛苦，這是應該忍耐的。

超過上述原因以外的物價上漲，不是由於商人的投機操縱，便是由於囤積居奇。這些商人，大半擁有雄厚的現貨，不願國家危難，只知投機以獲取暴利。這種由於少數人的利益，而陷多數人於痛苦的絕對損人利己的行為，却是不能寬恕的。政府應該用合法的權力，加以合理的取締和統制。

三、最近物價暴漲的解剖

我們抗戰已經三年，物價問題到現在才開始感覺嚴重。可見最近半年來物價狂漲的現象，并非完全由於對外作戰的關係，而另有其內在的原因。

於此，有一部份人拿貨幣數量說的眼光，認為國家所發的通貨過多，所以物價高漲。其實，這是一種皮相的觀察。我們現在國家銀行的現金出納，都用支票簽發去，不能兌現，還證明現在的鈔票並不過多，反有籌碼缺少的現象。據四行最近的公告，戰後通貨發行總額為四十萬萬元，戰前為十四萬萬元，就是說，戰後通貨發行，增加不到三倍，即加上地方銀行的鈔票，總額算六十萬萬元，

也不過戰前的四倍。這是與目前物價高漲到七倍乃至十倍以上的現象，配合不起來的。到是因爲物價高漲，逼着大量增發通貨，才夠流通。通貨的增加，遠遠趕不上物價的高漲，所以才有錢碼缺乏的現象，可知現在物價狂漲，絕非通貨膨脹的結果，而是由於旁的原因在作祟。

究竟什麼原因在作祟呢？就是最近由海外逃回的游資在作祟。有不少從前的一官一僚，或大地主，平日從百姓身上搜括來的金錢，在抗戰開始以後，都買成外匯，逃到國外去了。這種逃資，據時事新報所載崔健伯一文中所說，在兩萬萬美金以上，約值國幣四十萬萬元，等於我們現在通貨發行的總額。中央銀行出版的經濟彙報，所載香港一地逃資，即有五萬萬港幣，也就等於法幣二十萬萬元。這可知逃資的數目之大。

這種鉅額逃資自從歐戰緊急，香港限制提款以後，這般有猶太精神的涼血動物，覺得外國銀行也靠不住了，於是又狼狽逃回來。據說這些逃回的游資，在上海有港幣二萬萬元；其餘港幣三萬萬元則流入西南重慶約佔百分之三十，昆明約佔百分之二十五。這大量游資，像怒潮一般湧入內地，大事投機活動，從事貨物的囤積，所以從前擾亂外匯市場，增加國家負擔的，是這些游資！現在擾亂物價，增加人民負擔的，也是這些游資！

這些游資逃回以後，要是能供國家運用，或投資生產事業，那正是復興中國的好機會。無如這般涼血動物却從事囤積居奇，專做投機買賣。在歐戰爆發以前，上海物價相當穩定；即有上漲，也因受內地的影響。而自從歐戰發生以後，却由上海物價先漲，然後影響內地物價的上漲，這可以證明大部份游資逃回上海，已經開始在那裏搗亂物價了。

自從意韓停戰，滇越路交通封閉，南太平洋風雲緊張以後，因上海與國內市場失了聯絡，商人都爭先拋售存貨，一般日用品俱行跌價，尤其是棉紗大跌。投機家既失利於外股，又失利於棉紗，於

是便轉移目光，囤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煤，所以又造成最近上海輸出物跌價，而生活指數反而上漲的畸形現象。

以重慶物價而論，在上海物價穩定時，由上海運貨來渝，可獲厚利。因而經營運銷者多，故兩年來雖逐漸上漲，尚無扶搖直上的趨勢。自去年九月以後，上海市場也動亂起來，特運貨物，利潤不一定可靠了。於是滯在重慶的游資，便專在重慶四圍囤積。自從滇緬，滇越兩路相繼封閉，海運阻斷以後，一方面以存儲的工業品認爲奇貨可居；一方面更拋出大額資本，轉而囤糧。於是原有市面游資，與海外逃回游資聯結一氣，狼狽爲奸，便把重慶市場鬧得昏天黑地一發不可收拾；在這個物價飛漲的狂濤中，有一個炸後停電的晚上，筆者走過燈燭搖晃的街心，看看米店，都空了米。偶而發現幾家有米的舖子，有的賣到一斗（川斗，約合市斗三斗。）三十元，有的一斗三十五元，有的一斗四十五元。這不是漲價，乃是無價。漲價不足奇，無價乃真可異。在這一刹那中，使我感到這個無秩序的社會將有毀滅的危險，同時反映到國家前途的黯淡！

中國人自己的錢，逃到外國，本來是不合理的現象。現在因爲世界大局的轉變，逃到國外的游資，都從國外回到國內，從沿海轉到內地，從城市散到鄉村，這個方向并沒有錯，可惜路綫走錯了。故如何正導這個走錯的路綫，使大量游資運用之於生產開發與國家建設的事業，不僅是解決物價問題的關鍵，而且是戰後經濟復興的一個主要問題。

這種由囤積居奇而影響物價的現象，我們可用鐵一般的事實來證明。試即以重慶的紗價爲例：從上海運來的細紗今年三月間，購入成本爲每包七百二十元，運費爲四百元，雜費五百三十二元，利息二十一元，綜計爲一千六百七十三元；加上利潤百分之二十，作爲三百元；則細紗每包在重慶的售價，最高應爲二千元。而今年三月初棉紗的實際售價，竟爲二千三百九十四元，這就是商人投機操縱的明證！同期間，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爲時不過一個星期，

三聯制度的具體化

伍士焜

社會上有許多事情，經過人們創造發明和執行，已成為一種慣例，但是那種慣例，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雖然一部分析合理而大部分却不合理，有的本末倒置，不能一氣貫串，有的零碎片段，不能成為全璧。忽然有一個人，把這些慣例，「條分縷析」，「刪繁存簡」，「輯零為整」，「啓蒙顯真」，使它成為「金科玉律無懈可擊」，這是把一切優點，集其大成。所謂集其大成，就是加以鑑別整理的工夫，使它具體化。它的功績，實在超過發明創造的人以上，非有天縱英明的人，實在不容易做到的。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到現代，來找尋這一類人物，（一）從文化上看，中國古代的文化，經過先哲的創造和著述，有不少珍貴的文獻，但到了孔子的時候，才把它鑑別整理，給文化上鑄定了一種準繩，所謂：「自天子至庶人，中國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這是孔子把文化來具體化，使後人有所遵循的功績。（二）從政治上來看，歷代的政治制度，當然有創造和因革損益，但能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制度原理，來揚

棄它，使它普遍地來適應一切的政治環境，做救民救國救世界一個指針，實際上找不到一個人。到本黨總理，才敢負起這種責任。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就是摘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原理的優點，來使它具體化，給全世界黑暗裏放出一顆明星，它的效用，真足以救國救民救世界，它的政治真理，所謂：「傳之百世而不易，放之世界而皆準」。（三）從治事來看，歷代先儒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有很多的格言和語錄，即外國政治家，對於每一件事的研究和執行，也定了種種規律，但能把它揭示綱領，來做籠罩一切的準則，也沒找到有幾個人。我們聽了總裁演講三聯制度的意義，可謂集各種治事規律的大成，沒有一種事情的成功，能脫離這種規律的範疇，所有先儒的格言和其他的規律，不過是這種制度的註釋，統統可以把它分別歸納於這種制度的裏面。總裁這一啓示，無疑地是給我們工作上一個準確的方針，也是總裁把一切規律形成具體化的功績。

重慶紗價已自每包二千三百九十四元漲至三千四百七十元。一週間就漲了百分之四十四。而在同期間上海紗價上漲不過百分之十；貴陽且根本沒有上漲的趨勢。可知當時重慶紗價的飛漲，絕非因運輸的困難，也並非受上海紗價的影響。這是奸商操縱物價之又一明證。我們即使拋開利潤率和高漲比率不談。最低限度，棉紗與棉布棉花，在供求上有着直接聯帶的關係。棉紗、棉布、棉花，三種價格的變動，應為相同的比率。但自今年三月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棉花只漲百分之五十，棉布只漲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而棉紗的漲價乃為百分之八十二。這又可見棉紗的暴漲，并非由於棉布的需要驟增，也非由於棉紗的供給驟減，而完全為奸商操縱囤積居奇之又一明證。現在棉紗每包售價已在四千元以上，這種膨脹價值都由囤積而來。上面所說明的幾種現象，一可以從成本價值上證明囤積居奇之影響物價的上漲；二可以從市場變動上證明囤積居奇之影響物價的上漲；三可從物品供需上證明囤積居奇之影響物價的上漲。囤積與狂漲，構成因果的關係，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不過，這些事實，多少還可以說，是與供給運輸不無相當關係。但最近數月來，糧食，菜蔬，都在作惡性的暴漲，這又將如何解釋？如果說是供求的關係，則四川，湖南，江西都是產米之區；而且四川三年豐收，

好像機器裏面各種零件，雖然都有它各別的作用，但必須把每一件裝置到它所適宜的地位，來配合成一部機器，才能發揮它的效用。總裁所昭示的三聯制度，就是把規律的零件，裝置到規律的整個上面，來發揮它的效用，這不是一切規律到了具體化嗎？

二

三聯制度所以能使一切規律具體化，它的特質在那裏？很簡單的回答，它把設計執行考察三種工作形成聯繫，這種聯繫性，詳細來闡明它，就是：設計要根據執行考察而設計，執行要根據設計考察而執行，考察須根據設計執行而考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脫節，每一種工作，都有交互的作用，離開了某一項，就失了它的效用，離開了某一項，就是二聯制或單獨制而不是三聯制了。

總裁在這篇演講裏說：「我們無論辦理一樁什麼事情，必要經過設計執行與考察三個程序，而且要互相聯繫，不使脫節……必須事先有周密的計劃，計劃好了，就要按照計劃去切實執行，執行的時候，還有嚴格的監督，而辦理完畢之後，更要有認真的考察，按其成績，然後以考察所得的得失利弊，作為下期設計的參考……否則設計自設計，執行自執行，執行之後，沒有查考，查考之後，沒有懲獎，分離割裂，不相聯繫，就不能有成功的把握」。從總裁這段話裏

面，可以看出它處處把握住三聯制度的貫聯性，這無疑是它的特質。

這些道理，中國舊時有兩句話，一是「謀而後動」，一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所謂「謀而後動」就是要設計然後執行；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就是執行以後，要考察它的利弊，來做下一次的參考。但可惜這種道理，沒有貫聯，所以不能成為完整的規律。再從工作方面來說，我們做一件事，多數於事前經過考慮，這種考慮，就是一種設計，做了以後，也去看和考慮時候的目的是否符合，這就是考察，但是它這幾種工作，很難有一致的聯繫性，好像執行的事，未必經過考慮，考慮的事，未必去執行，執行以後，未必去考察它的利弊，即考察它的利弊，也未必拿它做下一次的參考，這樣沒有一貫的聯繫，當然談不到功效。即使偶然有相當的結果，也不是有必然性的，所以這種淺顯的道理，一般人腦裏，都有這種概念，但可惜貫聯不起來，以致無從奏效。

總裁更於這一點，舉一個例來說明，他說：「就五權制度相輔相成來說，彼此之間，更應該密切聯繫，以期推行盡利。即如立法院制定法規，其事近於設計，考試監察兩院應共同參加討論，而行政與司法兩院，尤應參加設計，貢獻其實際的經驗，以作重要參考；至於考試與監察兩院，也應該在工作

并無供給不足現象。即使說，有許多中央機關與外省義民遷入川省，但川省出征將士及壯丁無慮數百萬，也并無需要增加的現象。如果說是運輸的關係，則當地的產米，消費於當地，而且內河船運暢通，更說不上運輸的困難。可見半年來物價的暴漲，并非由於供給的減少或需要的增加，也并非由於生產的移轉，運輸的困難，或外匯的高漲，而完全是由於投機商人的操縱與囤積。

由於少數物價劇烈的變動，於是中小商人皆見獵心喜，競相購備；而消費者恐將來負擔過重，也競相購備；於是市場上表現需要的突然增加，商品的極度缺乏，而人心也隨之而頓然浮動。投機者乘人心浮動的時候，轉而投大量資本於米糧燃料的囤積。於是自由用品的狂漲，深入於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狂漲。漲風愈勁，而囤積愈多；囤積愈多，而漲風愈勁，這種惡性循環輪轉不已，於是經濟上發生空前的大騷動，幾至動搖國本，而人民的生存，也受到可怕的威脅了。

(未完)

上遇事聯繫，以期臨事之督促，與事後之考察」。這一段話是拿事實來證明設計執行和考察貫聯性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前面所說：「設計要根據執行考察而設計」，就是說設計的時候，要顧慮到執行時「人」「時」「財」「地」「物」的

運用，同時也拿考察的結果，來做參考。所謂執行，要根據設計考察而執行，當然執行依着設計的計劃，同時它也應拿考察的結果做一種參考。所謂考察要根據設計執行而考察，這裏的考察當然是注重它的執行的成績，但絕不可忽略它設計的原因；沒有好的計劃，怎能執行得良好的結果，而且有的考察也需要在執行之前來考察，就是考察它的設計精確與否，好像政府的預算，也須經過審計部來審核，這是考察設計之後，才交執行，這種貫聯交互的原理，隨處可以表示出來。

三

上面是說三聯制本質，它的特點是貫聯性。這裏再談到運用的問題，我們要首先指出它的特點，它的特點是具有獨立性。這問題也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個人或少數人的工作，他們限於人力物力，有時用一個人來兼辦三種工作，這顯然是一種包辦式，沒有獨立性，但是我們要明白，這並不是混合優於獨立，而是力量不足的緣故。一方面是三種工作，分開三部分獨立行使職權，就是一種設計機關，一種執行機關，一種考察機關，各自分別進行它的職務，合起來完成一個整個工作。

因為要進行某一項工作，負責執行的人，每每有了主觀的目的，他為達到這項目的

，因此把精神集中於某一觀點，而忽略旁的

原因，他只會走直線，而走曲線還要快些的道理忘却，好像總理所說，坐汽車從法租界到虹口，行曲路北直路還快的道理；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他拿出一乘大公的心來幹，已防有這些毛病，若把私人的利害感情來滲雜，那就流弊不可勝言，所以執行部門，一定要和執行分開而獨立；離開了私人利害，和感情，採取客觀的事實，統籌兼顧，來訂定一種縝密完美的方案。設計和考察，也是同一樣，因為負責設計的人，他們已經殫精竭慮，它自己不會再發見有什麼缺點，它一定等到執行以後，然後根據考察的結果，來做下一次參考；同時負責考察責任的人，他將過去考察的經驗，看了設計的方案，容易指出它的利弊，所以考察和設計，一定要分開。至於執行和考察，當然也是一樣，因為考察立於旁觀的地位，比較清楚，而且執行的人，有時為了本身利益，而把它的缺點，隱蔽起來，考察的人無論在執行當中，或者事後的查察，都比執行的人客觀而詳細，所以考察和執行，也要分開而獨立。

總裁在那篇演講裏面，特別提出五權制度在三聯制度中相輔相成的實例，而本黨七中全會更議決設立中央設計局及中央黨政考察委員會，來配合執行，這是三聯制度在政治裏面建立起來，而實施機構獨立的原

則。

在過去三聯制度在政治裏面，沒有詳細的分工，雖然它的形跡相像，而面面全非，所以每一種工作，都由執行機關自己來設計，執行之後，也沒有詳細的考核，因此，每一件小事，沒有全盤的計劃，有時只顧到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他方的利益，結果，這方得到利，而那方面會受了害。有時把物力浪費，本來一件工作，全部來做，用十分力可以得十分的效果，單獨由一個機關來做，用了七分力，只得到二分的效果，這種損失，因為事後沒有考核，不能發見，所以部門獨立，設計為全盤工作而設計，執行也須及全盤利益而執行，考察也向着全盤的情況去考核，這樣才能達到三聯制增強工作效率的目的；這種目的，就是由獨立而達到統一的。

四

在上面的闡述，可以找出三聯制度有三個特點：一個是貫聯性，一個是獨立性，一個是統一性，就是工作要貫聯，機構要獨立，目的要統一，有了貫聯性，一切規律才能具體化，有了獨立性，機構才能具體化，有了統一性，效率才能具體化，三種特點配合實施起來，三聯制度才能具體化，這是一個基本的認識。

三聯制度的理論，我們相信完美無缺，

中國民族文化的偉大性

高慶豐

在抗戰的今天，要復興民族並加強民族的自信心力，不必空談。不妨一看中國民族文化在國家歷史的發展上，盡了如何重大的任務。從這種歷史的事實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民族文化偉大的所在，而我們確定的認識，欲復興民族，必以復興文化為前提。但，這裏並不是寫文化史；所以也沒有把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源源本本敘述出來的必要，我們只想以顯示中國文化的偉大性，而使國人普遍認識並確信在目前發揚民族文化之迫切與需要。

當東亞各民族還在原始狀態之中摸索的時期，中國已步入文明的領域了。即以唐虞時代命名「中國」兩字的意義來說，實因當時我國民族，已過着相當的文化生活。是以民族性的培養，務以矯正偏激而持以「中道」，詔人御物，都本着這個原則的。如論語所說：「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中庸說：「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堯典說：「帝曰：舜，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都表示當時中國民族不偏不倚的中道性，也惟也，這樣才能同化異族，統制區宇。所以標明了自己的國家為「中國」，那是含有

深長的意義的。中國當時確是一個俱有文明教化的國家，公羊傳有這樣一句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曰：『因地不傍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中國人對於異族，夙主以禮義感化，而反對霸權征服的。這正是當時文化國家的特徵。其次，我國民族，尚有稱「夏」的，也始於唐虞，堯典有「蠻夷猾夏」的話，「夏」便是我國種族的名稱。據說文解釋：「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日，白兩手，文兩足也，會意古文夏。殷註：『中國之人，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夷也。』」從這個字意我們也可以推知我們文化在當時是特出於其他種族的。

上面，只就國名和種名的涵義，來證明中國文化在唐虞時代已經發展到了高度階段。至於唐虞以前，以及唐虞時代文化形態的具體記述，我們從古籍中也可以找出記載來。易繫辭載的：「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

總裁的指示，「昭如日星」，我們必須把理論成爲現實，不致成爲紙上空談，這是負政治責任人們的責任。我認爲我們應該盡力的地方有兩點：

一、現在中央設計考察的機關，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以全副精神力量來貫徹它的任務，絕不要以鬆懈苟且敷衍的心理，使它毫無生氣，同時要以公天下的心，從國家民族上着想，不要爲了個人或一部分的利益，來遷就某一種環境，或者爲了特殊的力量，就沒有人敢考察，這樣都是把三聯精神葬送了，所餘者不過是一個空架子，沒有絲毫的實質；這樣浪費了國家的公帑，貽誤了國家的公務，這種罪行，自無可寬恕，這是我們於施行這制度以前，所應有的警覺。

二、總裁所昭示的是一個大綱，是一個原理，我們同志，必須跟着這種指針，把它的內涵擴大，把社會一切治事的規律，都納入這一種範疇以內，無論那一樣工作，都有整套的規律，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最近總裁所演講科學精神的方法，我認爲在三聯制度裏面，應該占着一個重要部位，這是我們同志應「因心衡慮」去完成的工作。

如果能夠這樣，三聯制度，才算具體化了！

x x x

釋之致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剡木為

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至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

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

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釋

名載：『黃帝造車。……』

假使我們要多舉出古籍中的記載，仍然

很多；但只看上面這一段，便可以知道當時

文化情形的大概了。

其次，我們更可見看唐虞時代政教設施的

完備，即可推知當時文化發達的程度。唐虞

時的政府組織，設官雖然簡單，然政務賅備

，頗能以簡御繁。堯與皋謨稱其時官吏，不

過曰百工，百揆，百僚，足見是『設官甚少

』為數不過百，但其職掌則有如左列：

歷官 羲和及四子司歷象

司空 禹作司空，宅百揆。

總官 契為司徒，敷五教。

理官 皋陶作士，司五刑。

工官 垂為共工。

虞 益作虞，司上下草木鳥獸。

禮官 伯夷作秩宗，典三禮。

教官 夔典樂，教胥子。

納言 龍作納言，出納帝命。

唐虞時的國家政府組織，當然不能與今

日來比較，但看了上面的制度，也算很完備

的，尤其關於職掌教育的官職，設置兩官，

一為司徒之官，一為教官。前者係司普通教

育的，主要的任務，在教民以人倫道德，而

使之別於野蠻人種。如孟子所說：『人之有

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司徒之官，設教的方法，現已無

法可改。關於教官，則司專門教育，其施教

的方法，設有學校，名曰『庠』，亦叫『米

廩。』庠者養也，設庠所以養老，王制云：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所謂『國老』者，大概係指年高德劭而言

，所謂『庶老』，大概係指年高德劭，具有

學問經驗的長者。國家對於這些人優禮奉養

，並且使他們在學校中教育後輩，所以當時

的『庠』是傳播文化的機關。

中國洪水時代以至唐虞，是我國文化的

黎明期；就前述堯舜數端亦燦爛輝煌的文化

，也可窺其大概了。及三代以後，我國文化

已因黃金時代；哲學政治法律的思想，至周

末而大備，中國精神文化，在此時建立了穩

固的基石。

世界上開化最早的國家，有巴比倫，埃

及，印度，中。然以歷史最悠久，而能

至今存在世界上的，則惟有中國了。日人浮

田和民所著西洋上古史一書中說：『巴比倫

興於西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

為波斯所滅。埃及舊帝國，興於西元前四千

年，中帝國當西元前二千一百一十年，新帝國當

西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為波

斯所滅。』又高桑阿吉所著印度五十年史說

：『印度吠陀時代，始於西元前二千年，西

元後七百十四年，為佛教徒所征服。』然而

再看中國，雖然自漢唐以後，亦時有異族入

主的時候，然而不但不能征服中國，且漸為

中國所同化，這若非中國文化的偉大和優越

，所能如此的嗎。

我國種族，號稱五族，而以漢族為最大

；但攷諸史實，種族是非常複雜的不過因年

代既久，血統混合，異族經被同化，也漸漸

自忘了，這除了文化力量之外，武力能以致

之嗎？

最早的所謂蠻、夷、戎、狄、到春秋時

代，用武力或不能征服他們，但以夏族文明教化的力量無形中把他們同化了。自漢以後，我國民族時呈衰弱之象，而異族以新興之勢，得乘機侵略，屢有劫持中國政權的事。然即在彼強我弱的形勢之下，最後亦必為我族所同化，這更可以表示中國民族文化的偉大性。

五胡亂華之時，中國受異族的侵害是無以復加了；但至終仍被中國所同化，一切政教設施效法中國古制不論；（詳見晉書載記）即當時諸異族的領袖，也大抵宗向中國的文化，如劉淵、劉和、劉宣、劉聰、劉曜、石勒、石弘、石虎、慕容皝、慕容儁、苻堅、苻丕、姚襄、姚興、姚泓、李庠、慕容寶、慕容德等等沒有不身染漢俗的。到隋朝，那些異族已完全被漢族所同化，並與漢族混合了。唐朝一代的宰相共有九十八姓，其中有十一姓是異族的後代，隋文帝的獨孤后，唐太宗的長孫后，也都是鮮卑人，這足見種族的界限，已完全消滅無痕。

自五代到元末，中國歷史上又是為異族蹂躪的時期，這中間大概有四百五十年，中國民族在這種變亂流離之中，實具因疲衰老之象。委曲求全，甚至迫得走而無路；而異族以蠻橫之勢，馳驅中土，肆意侵略；但就文化方面看來，他們不只沒有跳出中國的範圍，創造一些新的文化；反而他們自己的根基，也是從中國女胎裏培養出來的。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民族的武力雖然敵不過他們，但中國的文化却把他們征服了。

這時期侵略我國的異族，有契丹，拓跋，女真，蒙古諸族。契丹於後梁開平元年，太祖稱帝，立國於我國的東北，國號曰遼。

後來疆土逐漸擴大，東至海，西至金山，流沙，北至曠胸河，南至白溝，擁有偌大的土地，自然他的兵力也很強盛。到了宋朝的時候，太宗，真宗雖曾屢次派兵去征討他，打算征服，可是總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還吃幾次敗仗，結果只有送些金錢，和他講和，在國際上成了對等的形勢。就政治的局勢看來，固然如此。但，我們說文化的一方看來，則不能不說他們已被漢族文化所同化了。如遼太祖對於孔子的特別尊崇，以後諸帝也都非常賞識漢學。（詳見遼史義宗列傳，聖宗紀，興宗紀，道宗紀，）

到元朝，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了中國，其政治勢力上對於中國民族固頗為虐待，然而所謂蒙古色目人等，究出野蠻之族，其殘虐諷陋可想而知，試想以野蠻種族與我文明民族相處，怎能不為我民族所同化呢？所以不久中國民族又復興起來，後來的滿清亦復如是，民國締造，溶五族於一爐，凡一切異族的觀念和界限，都完全消滅。

以上略舉民族同化的事實，不過僅就一般人所熟知的而言；其實要一一舉例的話，真是不勝列舉了。如高麗、安南、月氏、天竺、回紇、唐兀、弗林等等，自秦漢以後，漸被我國的文教，而混入漢族者，在歷史還可以指出若干。攷異族之所以能同化於漢族，大抵是憑藉我國文化吸收與陶冶的力量。

其次，就中國疆土的面積來看，自漢、唐、元、明、清以來，歷朝都有開拓，以造成現在的一個大國家。然自堯典禹貢所載看來，則三代以前，我國所轄領土，也已很廣，堯典說：「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中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禹貢說：「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指甘肅新疆的沙漠地），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而墨子節用篇亦稱：「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後來一般人稱國家為「天下」，雖然是個不確的稱號但以領土之廣，在古人心理中，視為恢廓無比，名之曰「天下」也是有因的。

中國疆域既然這樣的廣大，而能形成一個統一國家，歐洲面積與我國相埒，却分做幾十個國家。其中山川間隔的情形，並沒有大別，其所以一個是統一國家，一個是小邦分立的原因；即在乎一個能以文化力量陶鑄為一個大民族；一個則文化區分較大，形成多數民族所致。我國文化統一民族原不自今日始，「書同文，車同軌」早已是儒家的理想，而這個理想，自秦以後，便已經實現。書同文，便利人民意識的相互交通；車同軌

興中會時代革命志士提名錄

江天蔚

一 緒言

中國革命歷史，已經有了五十餘年，其間經過無數革命戰役，多少志士為主義奮鬥，犧牲生命，其壯烈事蹟，感人至深，各方紀載者固然很多，湮沒者亦復不少，且欲得一有系統而紀述詳盡的書籍，至今尤不可得，良可慨嘆！近者雜讀有關黨史之各種著作，深有感於中國革命事業之艱難，而先烈艱苦之奮鬥，無論結果如何，或失敗被殺，或失敗逃亡，甚至晚節不終，凡彼時身預其事，均欲為其一表彰，故略搜集整理，而草成興中會時代革命志士提名錄一文。據總理自傳中所云：「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由此可知自從總理提倡革命，及至成立同盟會，此一段時期之革命運動，其艱難不言可喻，一則民智之固塞，再則專制政府之鎮壓，三則保皇黨反對革命運動，而宣傳革命事業之難，固無論矣。此篇所言，大抵以總理之言論行動為經，而附以各個革命志士之活動為緯，而簡述之，個人所見有限，且身處前綫軍次，參考書籍不多，遺漏舛誤處，當屬不免焉。

二 總理與鄭士良

總理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即西歷一八八五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時年僅二十歲。當總理於十六歲時，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鄭士良。總理極稱許士良，在自傳中至稱「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總理以如畫之筆，活繪出一個中國初期革命者之豪爽俠義之氣概，士良乃為總理革命運動中之最初信從也。

總理二十歲時畢業於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兩地，開始革命之實際行動，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營防，迨至門徑既通，端倪略備。總理即與陸皓東北遊京津，深入武漢。迨甲午中日戰起（即一八九四年），鄭士良即在廣州籌設機關，準備在廣州起義。于乙未年九月九日，因從香港運械至廣州，事機不密，被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敗，鄭士良即與總理及陳少白同往日本避

，便利人民生活的交通。這樣便使廣土眾民的中國，形成一個大民族，建立大國家，直到現在，國內各地，大體語言相近，即難通曉的，也可以用同一的文字來溝通意見。風俗，習慣、信仰、又大數相類似。這種結合的因素，能不說是文化的力量嗎？

我們所以不憚辭廢的把我國文化發達之早及國家所藉以維繫存在的年代的久遠，以及歷史上異族為我民族所同化，廣闊有如此大的疆土，這兩點指出來，無非是要證明：第一、我國固有文化實具有不可磨滅的偉大性，它在我國民族的發展上，盡了很大的任務。第二、目前我國民族，為暴敵所侵略，以致民族自信力衰弱；而欲振興民族，必先振興中國的固有文化，發揚而廣大之，對於這一個信念，歷史的事實，已充分的給我們證明了。

一九四〇，七，十二。於重慶。

難，不久，士良仍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撥土重來，並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至庚子（即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禍起，總理認為革命時機不可失，即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舉義，後因總理被香港政府阻止上岸，不得潛入內地，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當總理至台灣，總督玉兒允助總理義舉，總理即擴充起事計劃，並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

士良即日發動，先佔領沿海一帶，構成據點，士良得令，即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漢新交深洲之清兵，盡奪其械，後復轉戰於龍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彼時日本政府更動，改變政策，台灣總督玉兒不能再允接濟惠州軍事，總理即派日本同志山田至鄭士良軍中，報告外援難至，相繼進行爲妥；而士良軍此時已共戰月餘，彈藥已盡，不得已，即將部衆解散，親率百健兒間道至香港。而日本志士山田以失路爲清兵所害。惠州之役，鄭士良爲主帥，翌年，不幸病死南洋。

三 四大寇與陸皓東

當 總理十七歲由廣州博濟醫學校轉學香港醫學校，得識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三人，其自傳云：「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所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余等爲四大寇」。時從上海歸來之總理同邑陸皓東名宗桂者，與總理相晤，遠別故人，暢談竟夕，陸皓東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總理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皓東服其論而傾倒焉，陸皓東聰明好學，真摯懇誠，才氣磅礴，英姿奕奕，能詩能畫，沉勇有識，乃命世之英才也，後皓東隨 總理至京津武漢窺清廷之虛實，觀

長江之形勢。時陳少白，與鄧蔭南，楊衢雲，黃詠裳等在香贊襄幹部事務。陸皓東則以乙未年九月九日廣州之役，謀泄被捕，與丘四朱貴全等同時殉難，而廣州水師統帶程奎光，與謀革命被捕，後亦竟死獄中。陸皓東會與 總理共同制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提交乙未年二月二十日與中會幹部會議，決議採用。以如此英才，竟以身殉革命，故 總理自傳中云：「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第一人也。」慨乎言之矣。

四 檀香山之興中會同志

總理於甲午中日戰起，(即一八九四年)以爲時機可乘，即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秘密宣傳革命，得孫德彰(即 總理胞兄)及鄧蔭南二人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並於是年秋間，成立興中會，開第一次會議於卑涉銀行何寬家，出席者有何寬，鄧蔭南，李昌，李祿，劉祥，劉壽，劉卓，曹彩，黃亮，鄧金，程蔚南，本賢，黃華恢，宋居仁等，舉 總理爲會長，發表宣言，此爲中國革命運動海外第一次之組織。時上海同志宋耀如，以中日之戰，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函促 總理歸國，總理即與同志鄧蔭南等歸國，積極進行革命，於翌年，而廣州之役起焉。

五 史堅如之殉國

當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史堅如會奉

總理之命，赴長江聯絡會黨，庚子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總理即命堅如抵廣州，聯絡當地豪傑，秘密佈置軍事，以期響應惠州革命，正鄭士良在惠州苦戰之時，堅如屢謀響應不果，即憤決殲滅敵會，以爲牽制，並廉售祖遺產業，得三千元，託鄧蔭南，黎禮密購炸藥二百磅，交練達成轉存福善堂黃守南處；已則以宋少東夫婦名義，在撫署側，賃樓房一座，連夜秘密挖掘地道，距兩廣總督德壽臥室十餘丈，即以鐵筒貯炸藥，安置地道內，以藥線爲引，燃引閉戶。約與謀者各分道出城，至港船相會，然許久無聲響，堅如乃獨返寓所，次早復安妥藥線，燃引閉戶而出，運詣西關毛文明寓，俄而轟然爆發，紛傳撫署被炸，而德壽仍無恙。堅如大疑，竟乘與往驗，始知雷管過少，藥未盡發，堅如仍擬再圖，爲同志所阻。于九月初七日乘輪赴港，中途被捕，於十八日慷慨就義。總理盛稱堅如爲「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氣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乃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至於日本志士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中稱堅如，爲一十八齡色潤如玉，溫柔如鳩之革命健兒，先以身試野蠻政府之斷頭機，從容而就義。其實，參與惠州革命之領袖楊衢雲，逃亡香港，不久，爲刺客殺於香港之寓所，兩廣總督德壽會懸賞四百兩金，以購其首者，君假名飛鴻，以蒙師自隱。時香港索兇手甚急，德壽恐露喉使陰謀，乃捕僑兇而戮之，以誅港督焉。

(未完)

